从“自讼”到“自适”
——曾国藩的读书功程与诗文声调之学的内化

陆　胤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晚清曾国藩汲取理学家读书功程和修身日谱的经验,有意识地将各种形式的阅读体验塑造为一门修身日课,对近代读书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日记详记阅读时间、节奏以及看、温、诵、校、批等具体“读法”,实为一宗特殊的阅读史材料。按照每日读书时段、书籍类型、阅读方式三个维度,分类统计现存曾氏日记所载 6529 次读书活动,可以发现“看读”“校读”等一次性或研究性阅读与“温读”“诵读”等反复进行的出声涵泳显著分化为两极。多层次的读法对应于不同类型的书籍,体现出曾国藩在经世视野下维持学问完整性和各门类平衡的努力。从历时变化看,以把握知识整体为目标的“自讼”功程逐渐让位于追求内在体验的“自适”调剂,诗文声调的意义于兹凸显。作为诵读材料的古文选本兼包“经史百家”,诵读声调既安顿了义理、考核、词章、经济在内的知识统一体,又渐有从这个整体中超脱出来的趋势。

关键词: 曾国藩日记;读书功程;读书法;诗文声调之学
中图分类号: I 206.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1)06-0110-12

晚清曾国藩为官治军三十馀载,饱经世变,却始终亲近书卷,格外重视读书工夫的记录和描写,有意识地将各种形式的阅读体验塑造为一门修身日课。长久以来,思想史家视曾国藩为道咸以降“士大夫之学”的化身①,文学史则强调其私淑并扩张桐城古文堂庑的努力。面对前所未有的世变,曾氏欲统合义理、考核、词章、经济,努力维系四者之间的平衡,其间的雄心、苦心和耐心,无不体现在他日复一日的“读书功程”之中。

曾国藩日记是近代文史研究中早已被反复利用的“过熟”材料,但若超越摘取史实的层次,借鉴晚近日常生活史和阅读史眼光将之“去熟悉化”,则其作为一种“读书功程”的特殊属性尚有待揭示。曾氏日记汲取宋元以降读书功程和修身日谱的经验,以不断订立的“日课”和日常读书的“自讼”为中心。所记不仅包括“读什么”,更凸显阅读时间、节奏、方式等有关“怎么读”的信息。作为秘示家人的修身榜样,曾国藩有意在日记中渲染“读书之乐”,却也并不回避“读书苦”和“读书难”。针对不同书籍类型和读书动机,看、温、诵、校、批等各类读法逐渐分化,体现了曾国藩利用多层次阅读把握知识整体的努力;各种“读法”在其生涯各时期的分布并不均衡,亦可反映学术侧重的历时变化。曾氏对于“读法”细腻而丰富的描写,树立了一个可供模拟的阅读生活典范,亦使其记载有别于一般仅略记书目版本或摘抄书籍内容的士大夫读书日记,成为适合真正意义上阅读史(而非“书籍史”)分析的材料。分类提取日记中的读书信息,统计其在曾氏生涯各时期的分布和趋势,亦将有助于落实既有思想史、文学史研究的一些印象式判断。

曾国藩一生嗜好诗文,凭借一己的权位声势,提升了词章之学在晚清士大夫知识整体中的地位。清

收稿日期: 2020-04-06
作者简介: 陆胤,男,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诵读式微与近代中国读书法的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7CZW044)的阶段性成果。

① 余英时:《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88—596 页。

末以来,学者论及曾氏诗文,多关注其在“声调”上的开拓。或谓桐城文论“极其精则曰神曰味”,神味至无形,“故曾文正以声调二字易之”①;或指曾氏古文声气早已逸出桐城矩矱:“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侧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②无论是张裕钊、吴汝纶探讨“因声求气”,还是民国以后唐文治推广“唐调”诵读,曾氏声调之学的流衍从不限于创作理论,更应包括日常诵读涵泳的工夫。论者已注意到古文“声音论”的阅读面向③,本稿则将在分类归纳曾氏读书行为的基础上,试图将诗文声调之学还原到日记所描写的阅读场景和读书动机之中。综计曾国藩毕生读书记载,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把握知识整体为目标的“自讼”功程逐渐让位于以温诵经书本文、诗文选本为工夫的“自适”调剂。诵读声调不仅攸关“文事”,还越来越成为安顿日益分化中“知识统一体”的一种策略。

一、作为“读书功程”的日记

现存曾国藩日记在不同阶段有微妙的性质差异,各时期记载读书行为的比重和意义亦随之而变。道光十九年最初所记限于琐事,仅出现4次读书记载。二十年六月初七日起重立日记,第一次立下功课:每日辰后温经书,日中读史,酉刻至亥刻读集,有所得则载《茶馀偶谈》。④ 从此日记中的读书内容逐渐丰富,且开始出现“阅”“温”“圈”“批”等多种读法的描写。这一变化,当与此时曾国藩接触唐鉴、倭仁为中心的京官理学圈子有关。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日记提到:“镜海先生(唐鉴)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间一天,甚欲学之。”(1.49)预示其日记性质即将发生转变。

唐鉴曾向曾国藩推荐倭仁的日记用功法:“每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1.92),更传示同人批点,以为“互质”之资。稍后曾国藩亦将此法转告诸弟:“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这正是明末清初以来学者自勘功过的“日谱”之法。⑤ 倭仁早年从王阳明心学证入,与河南同乡李棠阶互质日课,“一日十二时中,密密推勘”,有过念则必“自讼”⑥;后在唐鉴影响下折入程朱,但王学风格的治念日记却延续下来,衍为道光末京师理学圈的新风尚。曾国藩日记受其感染,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起,维持了几个月严格的治念日谱格式。今存此期日记均以一画不苟的端楷书写,追求“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⑦,并付倭仁等传看批点(1.134)。与读书有关的行为,也成了道德检视的对象:

> 早起,读困卦,心驰出,不在《易》而在诗,以昨日接筠仙(郭嵩焘)诗,思欲和之故也。饭后,强把此心读《易》,竟不能入,可恨。细思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1.122)

宋儒以读书为“维持此心”的法门⑧,曾国藩读书治念的工夫大概不外乎此;而“能入”“静心”“有恒”以及“心浮”或“心忙”与否,则是勘断读书成败亦即修身功过的标准。出声读书的“高诵”“高吟”之法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端,诵读的对象包括《孟子》养气章、《李太白集》等(1.114—5、126),且颇辨别心、气关系,以“气藏丹田”为课程(1.128、138)。吟诵《孟子》有助养气,高吟李太白诗却被判定为“重外轻内”

① 陈澹然:《晦堂文钥》,《历代文话》第7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93页。
② 李详:《论桐城派》,《国粹学报》总第49期,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③ 参见陈引驰:《“古文”与声音——兼及其与诗学的关联》,《岭南学报》复刊第5辑,第259—273页。
④ 参见《曾国藩全集·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册,第42页。按:以下征引曾氏日记,除《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外皆从此版,为免繁复,不再出注,仅在引文后标注册数和页码(用分割点隔开)。
⑤ 参见王汎森:《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2分,1998年6月。
⑥ 李细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6—60页。
⑦ 钟叔河编校:《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⑧ 参见张载:《经学理窟·义理》,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5页。

(1.126)。此时曾国藩已开始接触京中“工为古文诗者”,领悟到古文“辞气”“韵味”的深微①;但在理学家眼光的检视下,道光二十二年十、十一月间日记对“黏滞于诗”“耽着诗文”仍多有反省。诗文内容成为“自讼”一大目标,未必出自曾国藩本心,更有可能是考虑到倭仁等日记潜在读者(批阅者)而摆出的姿态。②

不过,这种治念日谱的格式并未能维系长久。道光二十三年起,曾氏日记中治念内容显著减少;当年六月外放考官,七月初八日起日记主要记载行程,书体也由端楷回到了一年之前的行书。有研究断定,曾国藩的修身日记到此宣告“失败”。③ 日后受其兄影响一度订立日记簿的曾国葆,也曾不留情面地指出“此事实是虚文”。④ 曾国藩日记中治念功程的淡去,可以从他个人学术路向的变化乃至整个道咸学风转向中找到解释。然而,在咸丰以后曾氏的记事日记中,道德检视的功能并未完全退场,而是在理学传统中选择了另一支资源,以“读书功程”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1965 年首次影印刊布的曾国藩《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始自咸丰元年七月,迄于二年六月,在曾氏日记文本群中颇为特殊。该种日记实是填写在预先印好的版格之中,全版分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八栏,末栏刻发挥朱熹《中庸章句》以阐释“绵绵穆穆”之意的一段话(图一)。这种预印版格分类填写的日记形式,亦称为“日省簿”。乾隆间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卷末便有一篇《日省簿说》,介绍“直书项款,横记事为”的格式:每日按往来、著作、居处、饮食、出入、书信等项记载,“至月底用小结,岁终用总结,则一年之举动行为了如指掌”⑤,相当于一种逐日记录的“功过格”(图二)。晚清时代预印日记版仍相当流行。⑥ 但具体到每日记载之时,预先印好的各项空格,往往不能填满。《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几乎每天都有栏目空出,“静坐”项甚至被借来记录睡眠状况,与刻版原意不无出入。惟有“读书”一栏的记载较为持久且充实。《曾文正公年谱》揭示此期日记突出“读书”一项,其实另有渊源:

> 至是公乃仿**程氏《读书日程》**之意,为日记曰《绵绵穆穆之室日记》。⑦

格式化的读书功程是清代书院教学的普遍手段,《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则有意摹仿元儒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程氏日程敷演“朱子读书法”,不仅是一套分年递进的教程,更细化到每日自早至晚各个时段的温、看流程,循环往复,不断增益,从字训、小学入门,最终掌握包括经传、史鉴、古文、性理书在内的理学知识整体。与曾国藩日记中的读书描写尤为接近的是,程氏日程针对各段学程和各类别、功能的书籍,早就区分了**“倍读”“看读”“讽诵”“暗诵”“句读”“点抹”**等不同读法,尤其强调通过“倍读”即出声温诵熟书,来贯彻朱子读书法“熟读精思”“虚心涵泳”的教旨。元刊本《读书分年日程》附有读经、读看史、读看文、读作举业、小学五种日程版格,区分早、午、晚时段和读、温、倍、看、玩索等读法,各标起止之处,供学者摹刻翻印后每日填写,亦与清人刻印“日记版”填写读书课程的用意类似。(图三)

---

① 曾国藩:《致刘蓉》,《曾国藩全集·书信》,长沙:岳麓书社 1990 年版,第 5 页。

②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曾国藩日记:“至岱云(陈源兖)处久谈,论诗文之业亦可因以进德,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辨诘。”天头有倭仁眉批:“固是,然一味耽着诗文,恐于进德无益也。艮峰。”(1.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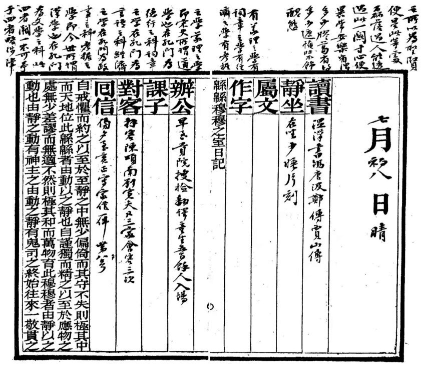
③ 彭勃:《道咸同三朝理学家日记互批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 年第 1 期,第 181—188 页。

④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卷第 69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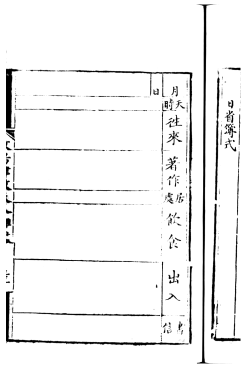
⑤ 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卷八,乾隆四十三年嘉定唐氏序刻本,第 31a—33b 页。

⑥ 曾国藩同时代的“日记版”用例,如上海图书馆藏咸同之际《王海客日记》,版格即分为天时、人事、德业三栏,“德业”栏又分为敬、怠、义、欲等列,供人圈填,类似功过格;上海松江区图书馆藏同光间《订顽日程》,版格分为天时、人事、自修、酬酢、著作、函牍、出纳等栏。此外,清末文廷式、严修等人的日记也都采用了预印的版格,严修日记的版格式样尤多,甚至曾借人翻刷。参见陈鑫整理:《严修日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前言”第 9—10 页。

⑦ 黎庶昌(曹耀湘代)编:《曾文正公年谱》卷一,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夏刊本,第 27a 页。



图一　曾国藩《绵绵穆穆之室日记》版格（咸丰元年）



图二　《文房肆考图说》附录“日省簿式”

图三　元刊《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所附“读经日程”版格

按预印格式填写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现仅存不到一年的长度，此后曾氏日记的主体便是咸丰八年六月起直到其易箦前一日近 14 年无间断的记事体。就记事性质和读者预设来看，咸丰八年服阙复出前、后的日记确实有所不同。是年七月，曾国藩致信曾国荃，称“兄此出立有日记簿……此后凡寄家书，皆以此法行之，庶逐一悉告，不至遗漏”；同时与曾纪泽书，亦提到“将日记封每次家信中，闻林文忠（则徐）家书即系如此办法”。① 曾国藩京官时期就有抄副日记寄家的习惯②，咸丰八年以后致子、弟书中频现“馀详日记中”等语，有意识地将日记作为家书的补充，每月乃至每旬托摺差或专勇带回。③ 咸同时期日记的记事密度有所增强，且不轻易付外人传看。④ 但也不能忽视曾国藩凭借日记为家人确立修身楷模的用心。其中关于读书功程的详尽描写，既是“自讼”功程，又是在胞弟、子侄这些小范围日记读者的仰视目光中宣示的生活典范。⑤

咸丰八年以后日记中的“读书功程”，并没有随着格式简化或记事增密而遭到削弱。读书记载在后期日记中反而更为丰富，甚至有时军事、公牍、应酬等行事竟成了读书间隙的点缀。后期日记仍延续了《读书分年日程》的框架，每日分早起、饭后、傍夕、灯后等时段载录阅、诵、批、圈等读书行为，时而自省读书的功过得失。最能说明咸丰八年以后日记“读书功程”性质的，是日记中不断订立的“日课”。现存曾氏日记一共有 11 次“立日课”的记载，除了京官时期四次（1.42、1.48、1.138 及《绵绵穆穆之室日记》第 3279—3283 页），咸丰八年以后七次日课中涉及读书的内容有：

（1）咸丰八年三到四月（补记）：读书二卷（卯初至午初）；**诵诗、古文**（酉正至亥正）（1.241）

（2）咸丰八年十月初六日附记：**温**熟书、览生书……（申酉戌亥）（1.310）

（3）咸丰九年八月十九日附记：……中饭后看书，极少十页，极多不过三十页……灯后，**温熟古文**一篇，千字以内者十遍，千字以外者五遍。（1.411）

（4）咸丰十年七月初六日：**夜涵泳熟书**，不办公事。（1.519）

（5）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灯后于文事加意……夜间：温诗古文、核批札稿、查应奏事目。（2.780）

（6）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将分内职事定一常课，作口诀曰：午前治己事，午后治公文……**二更诵诗书，高吟动鬼神**。（2.1206-7）

① 分别见《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卷第 253 页、上卷第 240 页。
②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卷第 4、8 页。
③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下卷第 311、317、504 页。
④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卷第 396，下卷第 172、376 页。
⑤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日曾国荃《致伯兄》：“十四日得十二月十八日所发十三日安报并日记册……每日仍不废看书数卷，古之所称天授，颂曰神人，岂不兼而有之欤？”《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下卷第 504 页。

(7)同治八年二月初六日:灯后看书、**诵古文**。(3.1612)

这七次日课涵盖了曾国藩从重出治军到平定太平天国后治理两江、直隶的各个时段,说明读书工夫在曾氏中年以后的修身功程中仍占有重要位置。而日记所记录的每日读书是否“有恒”,正是对这些“日课”贯彻与否的检证。此外,后期读书日课越来越强调夜间高声温诵熟书的工夫,所读内容则突显“诗古文”,更可窥见在摆脱了京师理学圈的视线后,曾氏读书理念和学问取向的新境界。

二、读书行为的动态分布与“读法”的分化

作为读书规划的“日课”并不能涵盖日常阅读实际,只有将每日记录的读书行为与预订的“日课”相对照,才能衡量曾国藩读书修身的成败。因此,有必要将“日课”落实到每日读书活动的记载,统计现存日记中所见读书行为的动态分布。在排日记载的体裁之下,具体读书行为的变化与分化,更可揭示有意识主张背后一些“见之于行事”的隐微趋势。

归纳读书行为分布和趋势的前提,是确定统计单位。阅读史研究多以书为中心,关注阅读书目及其种类、数量的变化。但各类书籍性质、功能、读法有别,更有部头大小之异:重要典籍需要长期、深度阅读,同一部书可能在不同时空或以不同方式阅读多次;另一些书籍却只是一过性浏览乃至翻看。有意义的数据不是读了多少种书,而是可感的阅读次数,且应纳入每次阅读不同的环境、动机、方式等作为变量。**本文以同一日内同一时段(早、午、晚等)以同种方式(看、温、诵、批等)读同种书为“1 次”读书,**作为基本统计单位①,在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共计得读书活动 **6529 次**。曾国藩由书生而服官治军,日记所见读书生涯亦可按生平大致分成三时期:a)咸丰八年以前片段日记反映的京官时期,共有 910 次读书记录;b)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服阕复出与太平军作战时期,计 1887 次;c)同治四年至十一年二月谢世的晚年,计 3732 次。这一粗略分期只是为了呈现变化趋势。每次读书活动具体的统计项目,则包括:**(一)读书时段、(二)所读书籍类型、(三)读书方式、(四)读书空间、(五)读书频率**等。惟曾氏对读书空间着墨极少,京官时期日记偶尔提及湖广会馆等场所(见道光二十三年二、三月日记),中年以后则多记载外出途中于轿、车、船内读书,往往待驻店后再增补批识。至于读书频率,日课中曾计划每日看新书“极少十叶,极多不过三十叶”(1.411),但每为他务打断,加之记载阙略,且不同类型书籍阅读进度有别,统计意义不大。下面仅就前三项进行分类,归纳每项各类别在曾氏人生不同时期读书行为中的占比,以及三项之间各类对应的分布。②

(一)每日读书时段

以《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为代表,理学读书功程将每日分为若干时段,强调在固定时段内按特定方式读毕预定书目。曾国藩日记记载读书活动,同样有很强的时段意识。按其生活习惯,可以把午饭(未初或未正)和晚饭(酉初)作为两个区分点,每日分早、中、晚三段。统计结果显示,曾国藩每日读书时段在咸丰八年前、后有较大变化:京官时期早间读书计 509 次,占同期读书总次数的一半以上;咸丰八年以降则晚间读书次数大幅上升,与太平军作战时期多达 1017 次,占同期总次数的 53.9%,早间读书比例相应下降到 16.9%。同治四年以后,早间读书稍有恢复,但仍以晚间为主。各时期午后读书次数都较少,常见一天内多个时段连续读同一种书的现象。

---

① 同一时间结合多种读法读同一种书,如“看”的同时“圈”“校”之类,仅计一次;短时间内以同一读法兼读多种书,如同治十年三月十六日有人送来《起礼诗集》《花甲闲谈》《馀冬录》,曾氏“将此三书略一翻阅”(3.1844),亦合计一次;同一天中以同一读法断续读同种书,如同治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早饭后……阅纪公《【阅微草堂】笔记》……午刻再阅《笔记》……中饭后……屡次阅纪公《笔记》……夜仍阅纪公《笔记》”(3.1745),仍计为一次。

② 限于论文格式和篇幅,以下仅摘取关键数据和统计结论,完整数据和表格详另文。

曾国藩屡次在家信中慨叹早年读书“无恒”,中年再出从戎始能“有恒”。① 咸丰八年后订立的“日课”中,仅一次要求早间读书(“卯初至午初”),另一次“中饭后看书”(1. 241、310),其馀则均突出申酉以后的夜间,甚至规定“灯后”“二更后”为专属吟诵的时段。日后门生回忆军中生活的节律,亦念念不忘曾国藩“酉初晚餐后即读经史古文,至亥正止,高诵朗吟,声音达十室以外”。② 与理学读书功程早起温熟书或终日诵书的惯例不同,咸丰八年以后曾氏日记中的读书时段多在晚间。除了白天军务、公务的排挤,恐怕也跟所读书籍类型和读法的分化有关。日记中夜间诵书最晚可以持续到三更后。“二更”更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隔开了此前相对公开的阅读活动和此后较为私密的温诵功程。有时候,二更后温书还要刻意“入内室”(2. 805-836、3. 1397),时段和空间的转换正是为了区隔不同的阅读状态。

(二)所读书籍类型

读书内容向来是阅读史研究重点,但要说明读书行为背后的知识谱系,必须对书籍进行有效分类,观察各类别的升降。在曾国藩的时代,四部分类当然是官方确立且曾氏本人也较为熟悉的分类法;但道咸以降学风的新变,又使某些类别的书籍格外突出:训诂考据之学在晚清仍葆有持久影响,此外则有理学的短暂复兴和经世之学的勃兴;身处汉、宋之间,曾国藩更主张以“三《礼》之学”缓和考据与经世的紧张。③ 礼书、典章制度、理学语录以及训诂考据等类书籍,有必要在四部之外另行统计。下面将曾氏日记所涉书籍分为**经书**(不含三《礼》)、**训诂考据**、**史书**(不含典志)、**礼学**、**经世典志**、**古子**、**理学**、**诗文**、**小说笔记**九类,分别统计其阅读次数在生涯各时期的分布。

总数上看,诗文类书籍的阅读最为频繁(2534 次),占日记读书总次数的近四成;其次为史书(1303 次)、经书(931 次),而礼学(463 次)、经世(493 次)等反映学术新变化的类型也占一定比重。相形之下,曾国藩素所服膺的理学书(228 次)并不十分突出,阅读总次数甚至还不如训诂考据类(278 次)。咸丰十一年三月,曾国藩于休宁围城留下遗命,自称“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④ 曾氏一生虽标榜义理之学,但安身立命的学问仍是词章。这也可以从上述统计中得到证明。

从动态变化看,经书和诗文的阅读在各个时期都较为稳定,读经次数占三时期读书总次数比分别为 15. 8%、16. 4%、12. 8%,读诗文次数三时期占比为 35. 3%、42. 8%、37. 6%;史书在京官时期较吃重,咸丰八年以后明显减少;三《礼》和训诂考据类书籍的数据,都在咸丰八年以后陡增,礼学书剧增的势头一直持续到晚年。

另外统计书籍类别在每日各时段的分布,则可发现各类书的阅读习惯在早、晚两极有明显分化:史书、训诂考据、礼学以及《通典》《文献通考》等典志书的阅读偏向早间;经书和诗文集的阅读则集中在夜间。尤其是诗文晚间阅读共有 1718 次,占到诗文类读书总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夜间温诗古文”的日课得到了切实的贯彻。

(三)读书方式的分化

活用各种动词具体描写读书方式,是曾国藩日记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士大夫日记读书记载的一大特色。继承朱子读书法“熟读精思”的宗旨,曾国藩强调针对不同动机、对象、环境必须区分读法:“看者涉

---

①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上卷第 191、230,下卷第 355 页。

② 此唐文治转述吴汝纶语,见《桐城吴挚甫先生文评手迹跋》,《茹经堂文集三编》,北京:文海出版社 1974 年影印本,卷五,第 24b 页。

③ 参见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孙芝房刍论序》,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91、300 页。

④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上卷第 178 页。

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二者截然两事,不可缺亦不可混。”①然而,日记中对“读”字的实际运用,并没有如此严格。早年日记有“读”《史记》各年表的记载(1.233-4),旁行斜上的表谱显然只能充当“看”的对象;又如咸丰八年日记首列课程,“卯初至午初”的“读书二卷”与“酉正至亥正”的“诵诗古文”分为两条(1.241),“读”反而与“诵”对立。事实上,日记中单独使用的“读”字涵盖了所有读书活动,本身并无统计意义。但围绕看读、温读、诵读、批读等不同读书方式,在“读”之外却有相当丰富的描写词汇,大致可分为七类:

1. **看读**:使用最频繁的是“阅”字,此外如“看”“览”“观”等,一般指单纯用眼而不出声的默读。

2. **温读**:主要以“温”字表示,即反复阅读同一篇章或书籍。曾国藩日记中多次重复读书的现象相当普遍,如经书中的《四书》《诗》《易》《左传》,史书中《史记》《汉书》《通鉴》,皆曾温读数过,贯穿一生;晚年则更以温诵《十八家诗钞》《经世百家杂钞》《古文四象》等自编选本为乐。

3. **诵读**:包括记背和吟咏在内的出声读书,最常用的描写词汇是“诵”和“朗诵”,此外还有“默诵”“循诵”“讽诵”“温诵”“背诵”“高吟”“朗吟”“微吟”“恬吟”“讽咏”“密咏”“涵泳”等。曾国藩对此类读法阐释最丰,构成其声调之学的实践基础。(详下节)

4. **批读**:包括“圈”“点”“批”“朱圈”“丹黄”“批注”“乙识”“题识”等在阅读中“过笔”的活动。曾国藩对“评点之学”多有鄙薄之词②,但早年为京官时却“日抱兔园册子,习常蹈故,以从事于批点”③。最初接触《古文辞类篹》和方、姚文集,也是凭借圈点为门径。④ 中年从军、为督抚以后,曾国藩仍免不了每日批阅公牍文件、幕僚拟奏乃至科场程文、书院课卷。晚年编选或重订诗文选本,常批、校并行,但有时“无善本可校”,只能“以意批点”(3.1488),则“批”又兼有校勘考证和鉴赏批评两重功能。

5. **分类标选**:指分门别类进行编次、选辑、抄录、“识目”等活动。曾国藩早年摘录《茶馀偶谈》即分为德行、学问、经济、艺术等门;日后更在训子书中指出:“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⑤除了分类编集诗文选本,中年以后温诵《周易》《诗经》《左传》《孟子》等经书或看读《通鉴》等史书时,常分类条记事项,识于书面或目录,或倩人分类抄出。如同治二年十一月间温《孟子》,“分类记出,写于每章之首:如言心言性之属,目曰‘性道至言’;言取与出处之属,目曰‘廉节大防’;言自况自许之属,目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厉之属,目曰‘切己反求’”(2.951)之类。

6. **校对查抄**:查阅、对勘、誊录不同文本的考据型读书,由“校”“对”“查”“誊”“抄记”等字表示。最常见的是文字对勘,亦有经义考辨(2.1276)。此类高强度的研究式阅读尤其适用于“礼学”类书籍,从中颇能窥见曾国藩预流考据之学的努力。

7. **粗翻涉猎**:随意、偶然或短暂的翻看、诵读等活动,多用“翻”“涉猎”等字词表示,或在“阅”“看”“诵”等动词前加上“粗”“泛”“略”“偶”“杂”“间”等前缀。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七种“读法”并不互相排斥。“温读”的具体方式可能是看读,更有可能是吟诵;圈点、分类、校对也经常同时进行;涉猎型阅读多为看读,但也有个别“偶诵”的记载,故另辟一类。根据晚近阅读生理学研究,没有一种读法可以完全离开视觉,“看读”(silent reading)和“诵读”这一对立本身就值得反省。⑥ 但就理学“读书功程”体例和曾国藩的学术意识而言,“看”“诵”“温”“批”等读法的分化至关重要,故仍就曾氏日记中的描写作出区分。

---

① 咸丰九年六月廿四日《复邓汪琼》,《曾国藩全集·书信》,第 1010 页;又咸丰八年七月廿一日《与纪泽书》、同治十年十月廿三日《与澄、沅书》,《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上卷第 140—141 页、下卷第 385 页。

② 《谢子湘文集序》《经史百家简编序》,《曾国藩诗文集》,第 256、316 页。

③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文学》下,光绪二年都门刻本,卷二十二,第 19a 页。

④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卷第 49、166 页。

⑤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上卷第 184 页。

⑥ A. K. Gavrilov, “Techniques of Reading in Classical Antiquity,”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47, no.1(1997): 56-73.

首先是各种读法在曾国藩人生各时期的分布:京官时期日记中,七种读法总占比才刚过半(内中还有部分重复),大量读书行为以泛化的“读”字记载(占同期44.9%),可见曾国藩早年对各种读法的区分还不是特别敏感。而在咸丰八年以后日记中,单独使用“读”字的情况减少到几乎绝迹(分别占第二期1.6%、第三期0.5%),读法的多样化描写占了绝大多数,表明其读法区分意识已相当明确。各种读法中,“看读”类总次数最多(3360次);其次是“温读”(1848次),“温读”在各时期比例有所波动:京官时期甚少,咸丰后陡然增加,在第二期占总次数的45.8%,甚至超过了同期“看读”的占比(42.9%)。相较之下,“诵读”(349次)、“批读”(523次)两类高强度读法的次数偏少。“诵读”类虽总体占比不高,却在三个时期中不断攀升;与之相反,圈点批读在京官时期较为频繁,咸丰八年以后则大幅减少。

各种读法在早、中、晚各时段的分布同样趋向两极。“看读”“批读”“校对查抄”三类均偏向早起到午饭前的早段;而“温读”“诵读”两种读法则集中在夜间(分别占温、诵总次数的82.4%和90%),“分类标选”也以夜间为最多。吟诵被多次“日课”确立在晚间,固不待言。重要的是,读法时段的两极分化与前述书籍类型的时段分化颇为重合,提示了各种读法与书籍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

	经书(除三礼)	训诂考据	史书(除典志)	礼学	经世典志	古子	理学	诗文	小说笔记
看读	132	248	887	361	431	76	201	912	155
温读	595	1	175	56	5	17	2	1009	0
诵读	91	1	6	0	0	1	1	251	0
批读	3	8	124	37	27	4	4	311	0
分类标选	38	0	28	0	0	0	0	41	0
校对查抄	5	23	16	14	21	1	1	74	0
粗翻涉猎	13	24	22	3	16	5	17	91	2

(单位:次)

根据上表,训诂考据、理学、经世典志、小说笔记四类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采“看读”法;史书、礼学、古子三类也以“看读”为主,但“温读”仍占一定比例。与之相对,**经书、诗文则最多采用“温读”法,**“看”“诵”次之。横向来看:“看读”最为普遍,“温读”极少用于考据、理学两类,“批读”多施于史书和诗文;**各种出声的“诵读”基本上只用来读经书本文和诗文集,阅读其他类书籍时几乎没有运用。**读书方式按书籍类别分化,正是曾国藩区分读法的应有之义。在咸丰八年训子书中,曾国藩举《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周易折中》为“看读浏览”之书;与之相对,《四书》《诗》《书》《周易》《左传》等经书及《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则为“讽诵涵泳”之书。所谓“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针对的主要就是经书本文和《文选》、古文、唐宋诗在内的诗文。①

三、诵读声调与知识统一体的安顿

曾国藩尝归纳君子有三乐,首先便是“读书声出金石”之乐(1.421),又曾教子弟以“八本”之说,前两条是“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1.485)。在“看读”为主的训诂考据之外,尤重以读、作诗文为中心的声调之学。然而,较之“看读”“温读”“批读”等其他读法,“诵”“吟”“讽”“咏”等词汇标记的诵读活动在上述统计中似乎并不占多数。日记中记载的诵读功课常有间断(1.381),密者连日吟诵,疏者数月一次。但也要考虑到单纯统计“次数”可能带来的偏差。如同治四年十月十五日记:“二更后倦甚,不能诵书。”(2.1197)详其文义,则似平日二更后诵书是常态,只是因为过于重复而未必体现在日记中,故此夜的“不能诵书”反而要特别记出。此外,温、诵常常同时进行,在日记中多以一“温”字概括,鉴于“温读”数据之多,则诵读频次理应大幅高于目前统计所得。回到日记文脉,诵读活动往往伴随关

①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上卷第140页。其中“韩文”既被列为看读浏览之书,又属于诵读涵泳对象的“韩欧曾王之文”,颇为特殊。

于诗文义法的评论或读书成败的反省,夜间诵读更是几次“日课”中有意凸显的环节,即便不一定每日坚持,仍是曾国藩读书理想所寄。

曾国藩的诵读习惯从何时发端？现存道光十九至二十五年曾氏最初日记中,出声诵读的记载仅 4 次,其中 3 次在早间,与日后集中在夜晚的吟咏显然有别。早期日记中最显眼的读法并非诵读,而是来自“明人评点古文之法”的各种批、点、圈、识。不过,大约从道光二十六年前后起,曾氏对“评点之学”的批评逐渐浮现。① 在道光二十五年复刘蓉信中,曾氏自称“浅鄙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②,诵读开始取代批点,成为治诗文的主导读法。到咸丰元、二年间《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中,出声吟诵几乎都在夜间,已成惯例。由此推论,夜间诵读的习惯大概形成于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元年这五六年之间。这段时间也正是曾国藩透过梅曾亮、戴钧衡等桐城后学接触方、姚绪论的时期。可惜此数年日记中断,无从探索影响的路径,但从《绵绵穆穆之室日记》正文与眉批的呼应中,已能窥见诵读实践对古文声气论的启发:

> 〔读书〕……读(《汉书》)景十三王传后二叶、李广传,夜朗诵李广传。
>
> 〔眉批〕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处,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③

此段眉批后被摘入《求阙斋日记类钞》,单看的话似乎只是在讲“为文”的段落接续;但查该日日记版格中“属文”一栏为空,所谓断、咽、吞、吐、承、提、突、纾之法,更可能是从“读书”栏所记“朗诵”工夫中领取的“妙用”。此类从夜诵而得的声气体会,在咸丰八年以后日记中更是常见。咸丰九年九月十七日夜温韩愈《柳州罗池庙碑》,“觉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已,庶渐渐可入佳境”(1.420);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廿四日酉刻温苏诗,“朗诵颇久,有声出金石之乐,因思古人文章,所以与天地不敝者,实赖气以昌之,声以永之。故读书不能求之声、气二者之间,徒糟魄耳”(1.698)。

除了在吟咏中体悟诗文声气,曾国藩日记所见诵读习惯的另一特点,是常以选本为对象,尤其是中年后对自编选本的利用。曾氏早年所读诗文总集,有《国朝二十四家文钞》《斯文精萃》《文选》等,雅俗杂糅,殊无法度。道光二十五年起圈读康刻《古文辞类篹》,咸丰元年始出现朗诵《古文辞类篹》篇目的记载,同时编有“曾氏读古文抄”“曾氏读诗抄”二种,后者即《十八家诗钞》。④ 咸丰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夜,曾国藩“将古文抄一目录,分为十一属,每属分阴、阳,以别文境;其一属之中为体不同者,又分为上编、下编”(1.431),是为《经史百家杂钞》之初步成书;每类境分阴、阳,又包含后来《古文四象》的思路。从咸丰十年七月起,日记中经常出现温诵“古文”某“类”某“属”或某篇的记载。此间所谓“古文”并非泛称,而是专指曾氏自己编抄的古文选本。如咸丰十年以后温读“古文”传志、杂记、书牍、哀祭、论著、词赋等,实即《经史百家杂钞》各类;而如“二更一点后温古文《庄子》《离骚》”(2.1119)、“夜温《汉书·艺文志》”(2.755)、“朗诵《系辞》上下传”(2.1214)等,亦可根据语境,判断其所温诵并非经、史、子原本,而是《杂钞》所载篇目。同治四年十月初五日“二更后整理新抄古文”,初七日夜“旋温‘识度’数首”(2.1195),实即编选《古文四象》的发端。次年十月初一日“编成目录,以为三复之本”(2.1306)。此后日记中的“古文某某之属”便多指《古文四象》。此外,偶尔出现的“古文简本”或“古文简编”即从《经史百家杂钞》摘选的《经史百家简编》,晚年又抄杜、韦、白、苏、陆五家闲适诗,二者都是专供“朝夕讽诵”的简本(1.486、3.1925)。日记中的“古文”篇目亦不限于曾国藩在其他场合宣示的狭义“古文”范围。举

① 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三年向座师季芝昌借书,后取其中《震川集》“加丹黄焉,效明人评点古文之法,识之以朱围、著之以褒讥”,三年后还书时颇为自责。见前引《求阙斋弟子记》卷二十二,第 1707—1709 页。

② 《曾国藩全集·书信》,第 22 页。

③ 《湘乡曾氏文献》第 6 册,第 3291—3292 页。

④ 《湘乡曾氏文献》第 6 册,第 3281—3282 页。

凡经、史、百家(诸子、理学、别集)、古文门类、十八家诗,只要“有文气”可诵读的篇章①,都可纳入“古文四象”的框架。② 可以说是在姚鼐文体、文境分类基础上,以“讽诵涵泳”的读法为范围,重构了一个知识统一体。除了诗、古文选本外,曾氏晚年日记还载录了分类摘钞《诗经》《孟子》《左传》等经书读本的尝试。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将《诗经》“选八十篇,分为十种,每种八篇,以便讽咏玩味”(3. 1353);次年六月廿九日又记:“将《诗经》分列兴、观、群、怨之属,胪为八类,共八十篇,开单将抄出,以备讽咏”(3. 1527),仍是出于日常诵读的需要。

在声调、节奏、气象这些“古文”标准之下,文章选本中的经、史、子、理学、典志等书籍类型原先适配的阅读层次被消解了,某种程度上都成了平等的吟诵材料。曾国藩尝教诸弟涵泳之法:“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③幕友回忆曾氏在安庆军中每日诵读《毛诗》,常说:“余于《诗》,讽咏而已,其不可解者,不强解也。”④这种不求强解的讽咏,似乎提示在文义的理解、记忆以及著作类型的层次之外,诵读声音本身就带有独立的、均质的价值。曾国藩平生爱诵《尚书》中《吕刑》一篇,咸丰元年九月已悟出“昌黎诸文皆学《书经》”⑤,九年九月十五日思“《吕刑》,于句法若有所会”(1. 419),十一年六月廿三日夜再温,指出“《吕刑》篇于后世古文家蹊径最近”,却惋惜自己“不能尽通其读”(1. 635)。至是年七月间得到戴钧衡《书传补商》,才对其文义加深了理解。(1. 642)然而,字义训诂的隔膜并未妨碍曾氏此前吟诵并理解《吕刑》的“安章宅句”之法。早在道光末叶,曾国藩就接受了很可能来自桐城的诗文声音之学,但连接字句之间的“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仍被限定为“明先王之道”的媒介。⑥ 其对于文章声调超乎文义和文类(著作类型)的把握,反而略近阮元从骈文立场提出的“文言说”。只不过阮氏所论“声音即文”基于考据得来的音韵,且与经、史、子等“笔语”区隔;⑦曾国藩的“声调”体会则来自长年的吟咏功程,涵纳了经、史、百家各种著作类型,却时而漂浮在经史百家的字、句之外。

诵读行为与声调之学、诗文选本相互生发的关系,还应回到包括看、温、诵、批、校等多种读法在内的阅读全景中来理解。发掘声调实践独立于文义、文类的“超越性”,并非否认曾氏对诗文以外知识的广泛兴趣。正如上节统计所呈现,在“诵读”“温读”为主的经书诗文选本世界以外,另有一个通过“看读”“校读”等方式把握并处在不断扩充之中的专书世界。曾国藩早年从唐鉴那里接受了义理、考核、词章、经济的知识整体观,最初强调“义理之学”为统率(1. 92)⑧,但很快又涵纳了训诂考据和诗文声气的视野。他竭力在四大领域之间保持平衡,自称“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质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窔”⑨;却又说“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⑩。虽然强调“掘井九仞”的深度阅读,但就读书实际而言,曾国藩自知不可能达到乾嘉经儒的专精,故更看重全体各门类的完整与对称。早岁学术孤陋带来的心头“大堑”,更使其阅读生活在诵读守约的门面背后,留下了大量骛博泛览的尝试。

---

① 曾国藩曾在教子书中罗列“七篇三种成诵之文”,但特别注明其中顾祖禹《州域形势叙》“排列某州某郡无文气者亦不必读”。可见“有文气”是诵读的基本条件。见《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上卷第 207 页。

② 参见《文章各得阴阳之美表》,《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上卷第 227 页。关于“四象”与诵读声气的对应关系,民国以后唐文治颇有发挥,见氏撰:《论读文法》,《国专月刊》第 5 卷第 5 号,1937 年 6 月 15 日。

③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卷第 166 页。

④ 方宗诚:《节录曾文正公遗书跋》,杨怀志等点校:《方宗诚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26 页。

⑤ 《湘乡曾氏文献》第 6 册,第 3501 页。

⑥ 《致刘蓉》(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全集·书信》,第 6 页。

⑦ 阮元:《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文韵说》,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605—606、608—609、1064—1066 页。

⑧ 又参见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与诸弟书》,《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卷第 17 页。

⑨ 咸丰元年七月初八、九日《绵绵穆穆之室日记》眉批,《湘乡曾氏文献》第 6 册,第 3280—3281 页。

⑩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卷第 293—294 页。

多层次的读法对应于各种类型的知识,体现了道咸以降士人重塑知识统一体的诉求。然而,以曾国藩的学养功底、身体素质和日常精力,特别是在中年外出治军、为督抚以后,知识完整性的维持正日益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日记中的读书实践亦多有胶着、落空乃至失败之处。各种读书困难引起反复“自讼”,更加剧了“志学不早”的心理阴影。晚年日记随处可见“一无所成”“无可挽回”“败叶满山”“全无归宿”等语,在他人看来许是功成名就之后的谦退,在曾氏内心则是掌握知识整体这一极高期许无望达成的痛苦写照。曾国藩日记中的读书困难来自主、客多方面:如“涉猎悠忽”“东翻西翻”“心外驰”“满腔逸惰之气”“神气昏倦”“方寸纷乱”等词汇所描述,皆为主观上的懒惰或难以集中精力。但这些主观困难的背后则是各种客观滞碍,如时间、精力的不足,公差、应酬的干扰,以及气候寒暑、疾病侵巡、老年遗忘等自然因素。自道光二十三年正月间吐血引发“眼蒙”以后(1. 153),“目蒙不敢看书”之语频频出现,眼病烦恼贯穿了整部曾氏日记,更对日常“看读”特别是晚间看新书造成障碍,却从反面促成夜间诵读习惯的形成。此外,如耳鸣、癣疾、头晕等疾患,以及亲友故去、战况胶着、官场倾轧造成的“心绪恶劣”,都可能是读书中断的理由。出于礼学经世理念,曾氏晚年曾用很大力气研读三《礼》及典志政书。同治五年十月十六日读至《仪礼·丧服》,“中饭后即不敢再阅,因医言腰疼由于用心太过也”,旋即换看《明史》,“盖读史本易于读经,而《丧服》尤经中之极精深者,是以病中阅之吃力”(2. 1311);六年三月到八年六月间连续研读《五礼通考》,但有时又得换看他书,因为“《五礼通考》义蕴较深,病中难于用心”(3. 1393)。可见不同类型书籍带来的困难也有程度之别,看读礼学、考据、典志等类的“生书”尤被认为是伤身之举。同治十年八月初九日,接近生命终点的曾国藩立下誓愿:“以后当不作文、不看生书”,但“温读”“诵读”不在其列,当晚即又“温《孟子·梁惠王》上下,取其熟也”(3. 1884)。

一方面是“看读”“校读”新书的师老力疲,知识整体的把握遥遥无期;另一方面则是讽诵吟咏带来沉浸式体验,温习熟书“如逢故人”(3. 1348)。无声校阅与有声温诵两极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读书可以用来去乏解闷、排遣悲怀、舒缓压力甚至逃避公务。曾国藩的“读书乐”不仅来自偶尔一阅的小说、笔记、杂著等休闲读物,更时而在经书和诗文吟诵的声调中获得。诵读不仅是“自讼”功程,也可以充当“自怡”“自娱”的手段(1. 585、2. 864、2. 1062-3、2. 1063)。正是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曾国藩将取自外部的诗文声调之学“内化”成了自家身心的诉求。而在日常诵读的实践中,能否诵出“金石之声”,也是曾国藩验证自家身心状态的指标。有时“倦甚”则“不能抗声朗诵”(2. 1061、1088、1197),乃至“朗诵几不能成声”(2. 1176);若状态好则可放声朗诵,“音节清越,有如金石”(2. 1157)。选择夜间甚至主要在入睡前的深夜(二更以后)进行温诵,固然有白天公务挤压和晚年眼病加剧的因素;但如其日课口诀“二更诵诗书,高吟动鬼神”所云,精神语笑,通微合莫,则似又有某种超验体会在内。同治八年六月廿八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有一段读书生涯的自我反省:“念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预其间,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无杜元凯‘优柔餍饫’一段之趣。”不断扩张的知识边界和反复自讼的读书功程,未必出于存养的内在需要,而恰是外铄之“名”驱动的产物。因此曾氏决心在“敬、静、纯、淡”四字上加功,“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足自适矣”(3. 1657)。这是曾国藩晚年读书的进境。

小 结

曾国藩日记中的“读法”描写具有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双重意义:既体现着道咸以降士大夫在经世风潮下扩充知识边界、统合学术整体的不懈努力,又启示了从日常吟诵工夫中发生声音内在体验的实践过程。曾氏早年深受京师理学圈修身风气濡染,源自宋元道学家的“读书法”和“读书功程”奠定了他后半生记录读书活动的基本格式:将每日读书行为按几个时段分别记载,在书目、卷数、版本等基本信息之外,更针对经、史、诗文、典志、经世、理学乃至小说、笔记等书籍门类和具体时空环境中各异的读书目的,有意识地区分看、温、诵、批、校等不同读法,偶尔提示阅读环境,时而抒写主观感受或考证新得。

按照每日读书时段、书籍类型、阅读方式三个维度,归纳曾国藩日记中读书活动的分布规律和历时

变化趋势,各类知识按“读法”的不同显著分化为两极:“看读”“校读”等一过式或研究式阅读,主要针对经说、史书、训诂考据、典章制度等类知识性书籍,注重量的扩张,贯穿曾氏生涯各阶段,反映了曾国藩一生不断追赶学术潮流、把握知识整体的雄心。与之相对,“温读”“诵读”等反复阅读或出声涵泳,则集中于夜间,专门用来对治经书本文和诗文选本,在曾氏中年以后成为日益重要的修身功课。作为道咸以降经世之学追求知识完整性的表现,读书行为的两极既相区分又须兼顾。

然而,为官从戎之馀的读书,往往受制于精力、学养、兴趣等因素,在各类读法之间保持平衡绝非易事。应用或研究型阅读(看读、批点、校勘)固然是经世致用和学术预流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曾国藩晚年却越来越倾向于把读书当作舒缓情绪、逃避压力的一个出口。吟咏声调的意义于兹显露。从“自讼”之苦到“自适”之乐,正是在每日二更前后的“高诵朗吟”或“密咏恬吟”中,曾氏独有的声调之学逐渐成型。作为温诵对象的文章选本兼包“经史百家”,日记中的“古文”亦涵纳了义理、考核、词章、经济在内的知识整体,却也有可能在吟诵中消解各类书籍原先适配的多元阅读层次,使之成为平等的吟诵材料。日复一日的吟咏实践更为曾国藩带来了超越文字表面的内在体验。这种沉浸于声音本身的内在体验有时甚至独立于篇章义理和字面训诂,诗文声调之学因此又渐有从知识整体中超脱出来的趋势。以有无“文气”(可否付诸吟咏)为标准,新的知识界限正在形成。

From “Self-indictment” to “Self-sublimation”: Zeng Guofan’s Reading Schedule and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Study of Tones in Verse and Prose Chanting

Lu Y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bsorbing the experiences of Neo-Confucian reading schedules and moral dairies, the brilliant late Qing statesman and military general Zeng Guofan consciously moulded various forms of reading experiences into a daily course of self-cultivation, 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reading society. Zeng Guofan’s Diary recorded in detail his reading duration and pace, as well as his specific “reading methods” such as silence reading, reviewing, reciting, collating and annotating, which serve as a special material for the history of reading. When the categorization of 6,529 reading activities included in Zeng Guofan’s Diary respectively by such three dimensions as their daily reading periods, types of books, and reading methods, we may find the one-time or research reading like silence reading and collating and the repeated chantings like reviewing and reciting were significantly polarized.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multi-level reading methods and various types of books reflects Zeng´s efforts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learning, and the balance of various types of learning under the vision of administering state affai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chronic changes, the Neo-Confucian “self-indictment” schedule, which aimed at grasping the knowledge as a whole, gradually gave way to the “self-sublimation” regulation, which pursued the inner experiences with the outstanding significance of tones in verse and prose chanting. As reciting materials for ancient verse and prose chanting, the selected texts also included those from classics and history of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Chanting tones settled down the unity of knowledge including moral philosophy, textual scholarship, literary expressing and studies of statecraft, with the gradual tendency to transcend this unity of knowledge.

Key words: Zeng Guofan’s Diary; reading schedule, reading method; study of tones in verse and prose chanting

(责任编辑　郑　园)